

# 棋苑萃珍

宋刻本《忘忧清乐集》

丁 瑜

围棋创始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中，已有关于弈棋的记载。《论语·阳货篇》有一段文字，生动地描写了孔夫子对奕棋的评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反映了二千五百年前，对弈棋的评价和奕棋在民间的普遍流行。以后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弈棋的技艺有了显著地发展，出现了很多论述弈棋技艺的著作。如晋司马朗撰《围棋势》、刘宋褚思庄撰《棋品》、齐范汪等撰《围棋九品序录》、梁武帝萧衍撰《围棋品》、《棋法》等。可惜这些专集著作，都因年代久远，散佚无存了。

现在知道刻印成书，传世最早的围棋著作，仅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刻本《忘忧清乐集》。这是一部围棋著作汇编，由北宋末年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辑而成。

《忘忧清乐集》包括文字和棋图两部分，以蝴蝶装<sup>①</sup>形式分装三册。文字部分编辑四种<sup>②</sup>著作：首列《棋经》十三篇，题为“皇祐中张学士拟撰<sup>③</sup>”。次列宋徽宗赵佶作《御制诗》一首曰：“忘忧清乐在枰棋，仙子精攻岁未笄；窗下每将图局按，恐

防宣诏较高低。”第三种是《棋诀》四篇，为北宋国手刘仲甫撰。最后列张靖撰《论棋诀要杂说》一篇。棋图部分精刻三国孙吴至北宋时期所流行的著名“棋图”和“棋势”五十余幅。

我国古代每以围棋比擬兵法，《棋经》作者张擬仿《孙子兵法》例，著“论局、得算、权與、合战、虚实、自知、审局、度情、斜正、洞微、名数、品格、杂说”共十三篇。分别论述围棋中的战略战术及弈棋的术语要义。这是我国围棋史上论述围棋技艺的杰出理论作品。本书作者张擬的生平事迹，不见文献记载。据《棋经》所题，仅知他在北宋皇祐时任学士。清《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辑《元元棋经》，其内容亦分为十三篇，篇目与张擬《棋经》均同，而题撰者名为“宋晏天章”。按晏天章乃元朝人，《元史艺文志》著录。《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题为宋人，实误。清钱熙祚<sup>④</sup>刻《守山阁丛书》曾为之辨驳更正。但是，关于《棋经》的作者张擬，自元、明、清三代以来，却从未有人提出怀疑。近两年中华书局和日本讲谈社都曾借用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忘忧清乐集》影印出版。二者在出版说明和有关介绍此书的文章中，<sup>⑤</sup>对《棋经》作者亦均肯定为“皇祐中学士张擬撰”。这是值得商榷的。

已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余季豫（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四《元元棋经》条指出《棋经》作者题张擬误，应该题为“张靖”。他根据宋邵伯温《闻见录》卷九记载有：“潞公（文彦博）为子弟，读书于孔目官张望家。望尝为举子，颇知书。”“望尝曰：吾子孙当以立、门、金、石、心为名。长子靖与潞公同年登科，兄弟为监司者数人，公遇之甚厚。”季豫先生结论谓：“盖即作《棋经》之张靖。其作擬者，草书靖字颇与擬字相似，传写之误耳。其称学士者，三馆职事之通称云尔。”余季豫先生辨证张擬为张靖之误，结论正确可信。只是他

当时未能目验《棋经》最早的刻本，仅据前人记载史料，论证张拟即为张靖，其说可信，而资料尚嫌不足。尤其是将“拟”字解释为草书的“靖”字，更值得推敲。因靖与拟两字写法绝不近似，把“靖”误认为“拟”的说法，实在牵强。

若根据现存宋本《忘忧清乐集》的内容和刻版特征考证张拟乃张靖之误，其例证却是有理有据的。试分述如下：按《棋经》的第十三篇，标题为《杂说篇》。《忘忧清乐集》文字部分的最后一种题为《论棋诀要杂说》张靖撰。两篇题目虽异，而内容完全相同。可以证明二书为同一作者。再从两书的刻版形式、行款标题加以分析研究，就更证明张拟乃张靖之误。匹《论棋诀要杂说》的作者题名为“张靖撰”。其姓与名两字均是同样大小之楷书镌成；《忘忧清乐集》中之《棋诀》的作者刘仲甫三字，也是用同样大小之楷书镌成。二书行款格式是一致的。惟有《棋经》的作者题名特异。其格式为“张学士拟撰”。“张学士撰”四字刻为大字，而拟字刻为小字，拟字与撰字之间又有数字空白。镌刻形式与前列二书题名款式迥然不同。此处所刻之拟字，绝非靖字之草书，实为模拟之拟。因《棋经》十三篇乃仿《孙子兵法》十三篇而作，故题曰“皇祐中张学士拟撰”。后人不察，乃将此拟字误为人名，使八百年前棋坛上增加了一名乌有国手。

《棋经》十三篇自成书之后，即为当时和后代的围棋国手奉为弈棋的圭臬。宋人于刻本《棋经》之后写有跋语谓：“我朝善弈显名天下者，昔年待诏老宗刘，今日刘仲甫、杨中隐以至王琬、李百祥辈，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元代人在当时的通行本中亦有跋语谓：“尔后作者迭兴，莫不极力模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此书“为弈家之模范矣”。近代弈棋名家也认为《棋经》中有些论点，在当代仍应引用，绝不失其现实意义。从这些评论中充分反映出《棋经》作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邃的理论水平。但是《棋经》作者的名字，自南宋初年发生纷歧之后，

或称张靖，或谓张擬，迄至最近我国和日本分别出版重印此书，犹认为是张擬的作品，不无遗憾。现在此宋刻本重新出现在天壤之间，在人民图书馆中供广大专家学者阅读研究，故借《文献》丛刊一角，为《棋经》作者正名。永垂后世，不被湮没。

《忘忧清乐集》汇编的另一部专集是《棋诀》，作者刘仲甫字甫之，北宋江南人（或称济阳人）。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最近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忘忧清乐集·解说》均谓刘仲甫是南宋人，这还值得商榷。按刘仲甫在北宋哲宗元祐、绍圣间入翰林为御前待诏，是当时著名的国手。宋、元、明历代棋艺家在评论棋艺水平时，往往以刘仲甫为衡量高下的标准。可见他在我国围棋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刘仲甫在去东京任职棋待诏之前，曾寓居钱塘，他在旅舍门前悬挂一面幌帜，上面书写“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当时不少围棋高手闻讯前去与他弈，曾经在城北紫霄宫展开过比赛，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于是名声大振。后来入翰林被聘为御前棋待诏。宋何薏著《春渚纪闻》，记刘仲甫事特详。何薏是北宋时人，其父何去非与苏轼（东坡）同时。《春渚纪闻》成书当在北宋末年，南渡之前。由此书之记载可证刘仲甫为北宋人。又据《忘忧清乐集》棋图部分中的《长生图》旁注有“东京于万胜门里长生宫刘仲甫饶玉珏黑先一百三十四着”的记录。又《遇仙图》旁注亦有“本朝刘仲甫”的记载。这两条注记说明“本朝的刘仲甫住在东京”既称本朝又称东京，其时代当是北宋无疑。

《忘忧清乐集》的棋图部分，均为历代围棋名家比赛棋艺对局的模式。较早的有三国时代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图。当代（北宋）的有刘仲甫的《长生图》、《遇仙图》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遇仙图》边栏之外刊有“本朝刘仲甫遇骊山仙媪弈棋局图，又名呕血图”一行十九字。从这行题字，可以想像出宋代国手之中不仅只是男子，而且还有杰出的妇女。时人虽然故弄玄

虚，托辞“仙媪”。但是，她的棋艺确实高超。以刘仲甫这样驰名大江南北，无人敌对的名家，犹然经过呕心沥血地艰苦拼搏，方始战胜了“骊山仙媪”。通过这场激烈地比赛反映出我国宋代妇女的精湛棋艺。

《忘忧清乐集》是一部有关围棋的精闢论著，它既汇集了弈棋的理论，又结集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这部现存最早的刻本中保存了大量宋以前各代的棋局和弈谱的资料，它在围棋史上和棋艺的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就更为突出。这部宋刻本《忘忧清乐集》，版框高20.5厘米，宽27.5厘米，白口，左右双边，每叶二十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版心下镌每叶字数，第七、八叶鱼尾下镌字数和一“荣”字。棋图题名左下方间有“周刁”两字。“荣”和“周刁”，当系雕版时刻字工人所记自己的姓名。全书用薄皮纸刷印，字体近似欧、柳之间，刻印精美，颇具南宋浙本之风格神态。书中避宋讳至孝宗朝。凡遇慎字均避，故可定为南宋孝宗时杭州地区刻本。书后附有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sup>⑤</sup>笔录钱曾<sup>①</sup>《读书敏求记》一则。黄氏并自撰跋文一篇，其中写道：“今秋（嘉庆壬戌）七月四日华阳顾氏<sup>②</sup>约观所藏书，大半为旧刻名抄，令人目眩心悸。内有《棋经》，余所遇之奇与巧无过于是，得之，意蕊舒放，欣喜竟日。他日当作《三续得书图》，取老杜诗句以名之，阅此谱者，其乐不更无穷耶！”从这段跋文，可见黄氏得书后的欢悦心情和对此书之重视。

黄丕烈晚年，藏书尽皆散出。此宋本《忘忧清乐集》先后历经长洲汪氏艺芸精舍、湖州金仁甫、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上海丁福保先生诸家珍藏。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丁福保先生将此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一九六六年三月陈毅副总理见到此书后，十分重视，曾建议影印出版。不久因“文革”劫难开始，出版此书的计划受到阻挠。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计划出版一套综合性的善本丛书——《古逸丛书三编》。此丛书均

是编选影印宋元旧刻中的精品，多为世上孤本，罕见之书。其中第一种即选定此宋刻本《忘忧清乐集》。一九八三年一月，此影印本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同年三月日本讲谈社也影印了这部棋苑中的珍贵文献。日本印本完全仿照原书大小和蝶装的形式。用墨选纸均极讲究，书衣用蓝绢，函套用梓木，内衬金线织锦。附印《解说》一册，内有缩印的全部棋图、棋势，均系中日文对照。一编在手，读文看图，都可一目了然，对中日围棋爱好者十分方便。这种出版古籍的形式和编印技术，是值得我国出版界参考借鉴的。

### 注

①：蝴蝶装是盛行于宋元时期的一种图书装订形式。它的装式是将书页反折，版心中缝的背口用浆糊粘连，不用线订，再以厚纸包裹作书皮。翻阅时，有如蝴蝶展翅，故称蝴蝶装，简称蝶装。

②：此书文字部分实际只有三种不同的著作。因第一种《棋经》中的第十三篇与第四种《论棋诀要杂说》完全相同，是为一种。只是后者增加了刘仲甫的注释。

③：张擬，《四库提要辨证》拟作儗。儗是擬的异体字。按宋刻本作擬不作儗。

④：钱熙祚清江苏金山人，字雪枝。叙选通判。后以赴京谒选，病歿京邸。生前好表彰古今秘籍，曾于道光中辑刊《守山阁丛书》，收录流传较少的古籍一百十二种。

⑤：见中华书局1983年1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0期。

又见日本讲谈社1983年3月发行的《忘忧清乐集·解说》。

⑥黄丕烈，清代藏书家、校勘家字。字绍武，号蕘圃。江苏吴县人。清乾隆举人，官主事。刻有《士礼居丛书》。撰写藏书题跋数百则，后人辑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又《杂著》一卷。均行于世。

⑦：钱曾，清代藏书家。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藏书室名“述古堂”、“也是园”。多度善本。撰有《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康熙四十年卒，年七十三岁。

⑧：江苏吴县顾珊，号听玉，与黄丕烈相交好。家住华阳桥，斋名试饮

堂，多藏善本。其祖父顾若霖，雍正间即以蓄异书名于一方。

## 来函照登

《文献》编辑部：

兹请求贵刊向文献工作者提个建议：希望大家在整理文献工作中“要认真地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前一代遗留下来的材料”。我国学术界有些同志对这方面注意得不够。举一个小例来说吧，今本《战国策·赵策》所记载《触谿说赵太后》一文的“触谿”，经清代著名的学者王念孙的考证，认为系龙、言二字合写而误。这与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及近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里的《战国策》所载相同。这一有力的古本依据，证明王氏的考证是相当精确的。已为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但近来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凡引《赵策》这篇文章的，大都一仍其旧，仍把“触龙”误为“触谿”，也很少有加以注明的。另对“太后盛气而揖之”一语，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的《先秦史传文译释》，仍解释为：“气冲冲地接见他。揖，拱手，这里表示接见的样子”。这种解释是不妥的。“太后盛气而揖之”的下文言“入而徐趋”，说明这时触龙尚未进来，太后无需“气冲冲地”拱手作揖。可见，“揖之”并非“拱手”。王念孙根据吴师道的研究成果，断为：“揖之”，即“胥之”。“《集解》曰：‘胥，犹须（等待）也’。《御览》引此策作‘盛气而湏之’。隶书‘胥’字作‘胥’因讹为‘彛’，后人加手旁耳”。根据这条考证，我们即可把“太后盛气而揖（湏）之”，解释为“太后气冲冲地在那里等候着”。这样，从上下文意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

从这个小小的事例来看，在我们注释古籍的工作中，对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还是不够的，需要认真改正。

此祝

撰安！

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知寒

84.5.18.